

从“改革开放”到 “伟大复兴”

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历史



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官方网站:

www.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Telegram (电报) 频道:

<https://t.me/revcommunist0cn>

电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instagram.com/revcommunist0cn>

前言

任何政党想要以健康的形式成长并长期存在，都需要其赖以生存的、持之以恒的阶级立场，以及能够以这个阶级立场为基础构成其坚定、无可动摇的支持者群体——要么是一个强大的独立阶级，要么是不同具有类似或完全一致利益的阶级共同组成的联盟。

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其政治主张无法取得它代表的阶级的支持，其支持者无法团结、精神涣散的情况下保持组织建设与政治强大。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其土地政策，将中国广袤农村中数以亿计的贫农整合为其拥护者，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其基层组织动员工人阶级，加以内战时团结国民党腐败的独裁统治下与国府离心离德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集团，才最终得以完成1949年的中国革命，建立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的首个工农联合政权。这一政权完成了驱逐帝国主义的经济蚕食对中国的政治操纵，结束了长达千年的中国旧社会时期土地与社会秩序，在一切层面上都实现了真正的进步和瞩目的成就。

然而，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右派官僚领导下发生的资本主义重建，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失去了其曾经赖以建国、执政的国家体制。在毛泽东时期，虽然中共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化问题，国家也没有完成工人民主制度的建设，但是许多抱有美好的社会主义愿景的党员与国家领导人仍不断尝试从这个体制内部进行改革，对抗官僚和资本主义重建的危机，并维持着工人阶级作为在经济与物质基础上的统治阶级。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引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缺乏全国性政治纲领、缺乏先锋党的组织基础的群众运动。文革中部分群众运动的独立性被迅速击垮，并转而为官僚利用为民粹主义的政治机器，使得这场运动没能建立起工人民主制度，而政权存在的足以让其崩溃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官僚集团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资本主义重建的进程，试图通过这个方法解决矛盾并维持自己的统治。

由于国家的统治阶级发生重大变化，中共治下的党权与资产阶级政府的行政权责也随之转向，二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中共从一个虽然官僚化，但是仍通过其施政方针维持强大基层动员与控制能力的政党，逐渐蜕变为一个腐化、保守、政策处处充满实用主义思想的威权主义执政党。这一转变是中共阶级立场重大转变的必然结果，由于官僚集团作为独立于生产者的特殊阶层，其决策过程受制于科层制的信息传递层级，导致经济信号在纵向传递中产生严重滞后与失真。由于缺乏来自生产单位与消费领域

的即时反馈，中央计划无法动态反映社会真实需求与资源分布，最终形成计划指标与实际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偏差。这种权力垄断必然引发双重矛盾：一方面，计划制定者试图通过行政指令消除市场波动，却因信息盲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官僚机构为维系自身管理合法性，被迫引入利润、成本核算等异质于计划逻辑的评价标准。这种矛盾本质上是权力结构异化的产物——当经济管理权脱离直接生产者，计划就退化为封闭的行政命令体系，其自我纠错能力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而持续弱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实现工人民主制度，而这恰恰是官僚集团不愿意看到的——这意味着官僚统治的终结）。此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国际分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导致工人国家必须与外国贸易才能正常发展生产力，而这就意味着它必须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也就是说，工人国家必然要进行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不仅为获取外汇技术，更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世界市场的价格波动与资本竞争压力构成外部强制力，迫使工人国家必须调整生产结构以换取外汇和技术，此过程必然强化商品货币关系对国内经济的渗透。同时帝国主义军事威胁迫使资源向国防倾斜，挤压民生投资空间。最终官僚只能求助于资本主义下的利润指标来完善经济，从而逐渐放弃指令性计划经济并转向私有制。因此，官僚必然在最终决心重建资本主义，并迫使工人阶级丧失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再一次产生和壮大与资产阶级官僚的上台令所谓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转向全社会劳苦大众利益的对立面，而使中共不得不加速朝着更加保守、充满剥削的方向疾驰——中国共产党不断蜕化，成为了一个由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官僚拥趸掌控的资产阶级波拿巴组织。中共先前立足于让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之上，为党内政治矛盾所限制的残缺体制，逐渐转变为依托自身政治权力，试图平衡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并以“仲裁者身份”试图维护体制稳定与官僚集团存续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体制。由于这一所谓的裁决者身份完全来自资本主义之中的阶级矛盾与冲突，其必然转而维护资本主义经济与剥削的存续。

这一变化终结了中共在执政前四十年中建立的，以宪法所规定的唯一合法执政党领导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为主体，以党干部与地方官僚为政治主体统合群众的地方执政模式，逼迫其在诸多领域不断改变策略。中国共产党自1980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及其现状同它的老对手，在于1950年代大陆地区的国共内战基本结束后走向彻底失败、崩溃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愈来愈相似。然而，中国共产党坐拥中国土地上所拥有的先进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所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这一现状导致其必然不会像以买办金融资本的阶级利益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一般固步自封、腐败颓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成为了全球其他资产阶级的“现代奴隶产地”、“盟友”与“头号竞争对手”。中共，正如世界上任何有组织的政党一样，其行为都符合物质现实变化所引发的连锁反应，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草创到繁荣再到追求争霸、位居世界之巅，中共在过去四十年不断变化、顺应其经济基础，面对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压力，其必将因为资本主义的重建而走向任何新型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内部矛盾都必然走上的道路——帝国主义。

本作品力求通过分析中共的党史与中国的经济史，系统性阐述中共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与政治政策和现状，并确立一个一切科学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共产主义者都应当了解的事实——帝国主义全球争霸时代必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无法缓解时再次到来，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的手段。从改革开放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共顺应着这样的历史潮流，慢慢走入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深渊。此外，我们通过中国的经济史，也可以了解一个工人国家是怎么样官僚化，乃至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的。

目录

07

党权与党争——毛泽东时期的中共建制

08

历史的十字路口

11

筑起“世界工厂”

15

“世界工厂” 牢头的抉择

22

北京的阴谋家

25

全面崩盘的国内改革

30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32

“一带一路” ——中国帝国主义的双重性

35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反噬

3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死路

党权与党争——毛泽东时期的中共建制

在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末的毛泽东时期，中共的党权不仅相对独立完整，而且在高层架构中明确区分了党机关与国家行政机构。这种布局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立足于工人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物质基础之上，**作为具有超然地位的执政党对国家进行政治领导，而不必直接介入如政府办公，审查核算，政策打磨与具体执行办法等**由如“人民政府”或“某某部门”等“行政机关”，而非“某某地方党委”这些“党的政治机关”处理的日常事务——与今时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党委与地方政府机关基本分开，并不使用同一套官僚干部班子。在这一阶段，党的政务官指导和监督政府中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不进行关键方针与政策决策的事务官；党的政治干部确保政策的执行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贯彻都能基本依照党中央的决策执行。具体到现实之中，则体现为党权与党的政治方针和讨论同日常的行政工作基本分离，方针性与导向性的文件与指导皆由省级与北京中央党组织发布，而市、县、乡、镇等地方党支部依照这些政治方针，指导当地政府与合作社、公社组织出台、实施具体执行办法。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央高层能够对绝大多数问题发号施令，掌握绝对权力的同时，中共省级以下的各地方党组织又能够以超然地位对行政工作起到关键的指导作用。

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地区的中共党组与党委，同今日中共党政完全一体、党组织溶解于行政机关与行政工作的状态完全不同：如 1960 年代的北京市政府，各部门设立专门的北京市党委驻外党组，这些党组几乎从不参与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而是负责监督和制定政府部门的政策指导方针，并以类似督查的模式确保政府行政操作符合党的政治总纲。因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党组织仍然保持高度的政治独立性，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们完全明白一个应当立足于政治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溶于日常事务对其党权独立性的危害**——即党的政治独立性与超然地位必将为日产的冗杂工作与官僚化的办公内容所僭越、空心化；因此，北京的**党中央多以行政工作是否贯彻中共高层的“总体路线方针”为核心关切，而尽可能避免直接通过党组织干涉政府的事务执行。**

而在这一时期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农村地区，中共成功利用 1954 年起直至 1960 年代中后期持续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农业集体化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关键土地政策，**将农村的领导权牢牢把握在以党干部为领导核心的地方单位中。**通过消除落后的农村土地关系以及国民党执政时期农村宗族势力与资产阶级行政官僚一手遮天的政治现实，中共成功将地方党委与政务官树立为社会治理与政策制定的核心：在土地改革中，约有 300 万地主被剥夺土地，而超过一亿的农民受益于土地的重新分配，完全打破了传统地主阶级对农村的控制；而在随后的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约 97% 的中国农民加入中共领导下的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公社作为农村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担任了基层政府机关的职能。而随着先后发动的各类政

治运动以及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中共成功为农村生产和行政性工作集中了大量的劳工与知识分子，将近 1700 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推动农村教育和卫生等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中共具有绝对控制的农村无产阶级力量；至 1960 年代末，中国 98% 的村庄设有组织工作清晰、完全受各县、乡、镇中共党委领导的农村党支部，动员农村人口在党的领导下实施具体的生产活动与基层治理。通过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加强基层组织工作，中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在毛泽东时代就从根本上消灭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巩固了其执政建制对于中国乡村的基层控制。

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党政模式，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可以十分轻易地外溢到地方**，这一传统甚至直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和各大“地方局”取消建制、各个“地方派”论功行赏的时期。在这一体系下，各地党委由一位书记所总领，而这位政工干部往往隶属于某一党内派系。以此为基础，此时的**中国政治体系内飞速建立起了若干个巨大的官僚化的政工干部所形成的权力网络，并以此为基础阻挠任何工人阶级寻求民主的诉求**。同时，由于中共内部有许多政工干部没有接触过系统性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的政治认识仍然受到中国古代社会、近代的清朝时期与中华民国时期行政方法的影响，其往往轻易导向官僚主义的执政方针，并同先前的地方官僚实力派合流，形成一股中共内部反对工人民主制度化的力量。尽管许多中共领导人曾经试过以政治运动和党内整风的方法处理党官僚不断堕落趋势，但是官僚阶层结构化以后内生性的保护主义阻止了任何以城镇行政中心为基础的、自上而下地从官僚阶层内部进行改革的尝试；而由于此时的中共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极大，其也没有能力将全部精力运用到党内的政治斗争和反对官僚的问题上。因此，中共执政体系的内生性危机便一拖再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被彻底推翻。

历史的十字路口

随着中共地方官僚主义派系在原本的政治基础上掌控中共中央，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共内部坚持旧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立场的党员失势，**实用主义官僚集团的上台导致中共中央开始逐渐扑灭地方党干部与普通党员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党的实用主义化以及党本身的行政官僚化（即由党员愈来愈多地直接担任地方政府与行政单位部门官僚等措施作为起始，至今持续数十年）进而令先前的党政体制不再可行；随着一个**完全放弃了任何“意识形态原则”、秉持彻底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上台，他们急切地希望同在当时已日益僵化的所谓“苏联模式”（这一所谓模式的僵化问题实际上全部来自于同一群官僚自身忽视工人阶级需求、镇压其民主诉求所导致的）做出切割，并通过资本主义化政策为自身牟取现实的物质利益，希冀以放弃社会主义为筹码争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冷战与国际贸易中对华缓和，为自己所掌管的、因缺乏社会主义民主而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续命。在此基础上，中共急于转变其地方控制模式以

巩固新党国体制下的乡镇基层掌控力。随着工人国家时期大规模工业化积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中共地方组织的任务从动员工人阶级参与建设变化为安抚民众，重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与“增强经济效益”**，中共的角色逐渐从一个主要依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政党转变为完全依赖经济发展与执政稳定性维系权利的纯粹技术官僚组织，在政治定义上更像是政府机关附属的人员选拔机构。1980年代起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开始，不断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内部裂痕不断扩大，进而不断堕入新的危机。



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上，中共在自1980年代资本主义重建后的数十年内不断遭遇挑战。在准备结束计划经济的1982年，中国的城、镇、乡地区共有超过一亿五千万工人从事有组织的社会化劳动，这其中，有超过八成的一亿两千万人属产业工人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蓝领工人”，占全国人口近八分之一，该年工业产值占中国全国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些工业产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能够保证相差不大的人均工业产品消耗，并且基本无法产生较大规模的生产过剩（主要指产能过剩，由于缺乏工人民主，官僚指导下的计划经济经常出现产能分配不均导致的局部性产品过剩与产品短缺，但是一些工业品的生产计划问题并不会影响总体分配的相对公平）。**施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首要条件是通过产能过剩与剩余价值剥削下的分配不均创造一个令资产阶级受益的资本主义市场**，并以资产阶级为基础不断巩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这一体系所需求的根本经济基础就是廉价劳动力与失业者后备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官僚首先从庞大的中国第一产业开始，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与所谓的“国企改革”**，令大量传统产业工人失业、下岗，产业工人数量从1982年的近九千万在十五年内锐减至1997年前后的约四千五百万。随着产业工人的大规模失业，中国国

内同时出现了工业产品价格的飞升与劳动力价值和劳工收入的暴跌：以 1982 年为基准指数 100，工业产品平均价格至 1997 年已经上升至 240，而劳动力工资指数则呈下降趋势，降至 70 左右（这还是在考察货币购买力变化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购买力平价后的实际的工资指数应降至 30 左右），二者走势出现明显背离。这种背离正是由于在大规模国企改制和私有化过程中，产业工人大量失业导致劳动力供过于求，初步私有化的前国企为了弥补产能降低而推高产品价格的直接反映。这一物质基础直接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工业品价格相对高昂的市场。

计划经济崩溃所直接导致的就是党独立于行政机关这一政治状态的终结。与毛泽东时期拥有超然地位，政治性领导一切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的是，在投身于威权资本主义的党内官僚领下，**党的任务从探寻“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框架下建设国家”变成了“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主义体制，来者不拒地运用政策发展经济”。**随着以上述的稀缺性为基础的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在中央官僚的政策牵头下基本成型，资本主义体制的实用主义逻辑占据上风，中共不再需要维持一种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总路线、总方针，也不需要各个地方行政机关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于是，党官僚与政府行政官员的界限基本模糊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共所依仗的统治阶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党委、各企业与经济部门党支部不再是政治中心或者“政治总纲”，而变为由行政官僚兼任的党干部职位以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的繁荣并介入国企改制、加速私有化进程。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许多所谓的“党干部”与“党组成员”的帽子都戴在了那些行政官员的头上，他们用着中共党官僚的头衔领导一系列政府工作，如地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组，对外贸易的招商引资，1980 年代末至将 1990 年代初的诸多国家和地方项目等等；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共好似从一个伟大领袖、光辉政客的政党变为了一个“务实干部”、“青天大老爷”的俱乐部。原本占据重要领导地位的各级党委“一把手”（党委书记、党组书记等）却被中共高层要求“不再担任地方政府的行政一把手”，地方党支部与独立于政府的党员也被要求“不要干涉地方人民政府的日常行政工作”。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邓小平时代后期以及江泽民时代尝试进行所谓“党政分开”工作，实则是争取**彻底取缔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所拥有的独立政治意义和政治纲领，通过彻底弱化党官僚的独立存在以完整中共体制的彻底国家化并将中共深入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治理单位化为中国国家政府的一部分，争取将中共的党组织虚级化，变为一个完全让位于中国政府和资本主义体制，为其提供单纯的政治合理合法性的橡皮图章。**只有这样，中国的资本主义重建才能在资本主义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旗帜下，摆脱毛时代党组织剩余的最后幻影阻挠资产阶级官僚彻底拥抱其反动、反工人阶级利益的目的、残留至今的桎梏（无论是的社会主义外衣，还是党先前深入基层群众，以基层无产阶级党员为主体的组织策略），开足马力为资本主义繁荣这一目的服务。对于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而言，最好的情况莫过于中国政府一直由一群“名义上的中共党员”所

运作，把中共的一切机关弱化为一种仪式性的、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任命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单位，并通过文官政府与各路资产阶级的直接合作达成他们理想中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与“中国政府”这两种术语几乎可以混用，而这在毛泽东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决策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果，更是低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于一个稍显弱势的国家与政党所能展现出的最大的恶意。由于资产阶级对于各级立法机关、地方政府等资本主义制度下代表其资产阶级利益的的国家机器先天具有极其强大的影响能力，中共中央领导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若是失去了一个强大、具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某种独立政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一切政治地位都将迅速被资产阶级扫尽历史的垃圾堆，而这样的政治现实也将在十几年后彻底扭转先前的“既定方针”。

筑起“世界工厂”

既然中共的新官僚们为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献上如此丰厚的一份见面礼，以美国金融资本为首的全球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寡头自然也投桃报李，于改革开放后开足马力在华投资，将中国建设成为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雇佣奴隶制国家”——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小册子中所论断的，发展到顶点的资本主义国家会通过金融垄断的方式，将本土的工业与各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可能地转移到工业基础较差、现代化产业刚刚起步的国家，以此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牟利与安抚国内工人，通过本土去工业化的方式尽可能削弱最具有组织能力和革命性的产业工人的阶级力量——**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所扮演的角色就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国家所属“殖民地”的地位**（这只是一种类比，而非对其的定性）；只不过，由于全球的金融资本已经在上个世纪将全世界几乎每一份土地与每一个国家的财产瓜分殆尽，中国这最后一片劳动力极为丰富、工业品需求量极大、其官僚竭力谄媚国际金融资本，调节本国汇率以迎合外国资本的投资和商品进口需求的国家就成了**全球资产阶级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也正是因此，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成了中共官僚的“黄金十年”，随着中共着手于完善资本主义市场建设，吸引大量外国投资涌入，中国政府得以缓解极高失业率带来的政局不稳，并着手从1980年代末持续至1990年代末全国工人运动的余波中复苏。**中共成为了“世界工厂”当之无愧的“厂长”，代替全球的所有帝国主义“股东”们牢牢锁住工厂里的每一名工人。**

但是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在此过程中**仍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非“新殖民地”。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制造业时，中方通过强制性技术转让条款和合资企业股权比例限制，确保技术溢出效应。世界银行2008年报告指出，中国汽车产业要求外资合资比例不超过50%，且中方保留品牌所有权（如大众-上汽模式），使中国在2005年后逐步掌握整车平台研发能力，催生奇瑞、吉利等自主品牌。这与拉美

国家被动接受外资控股、丧失技术升级路径的模式（如墨西哥汽车业）形成本质差异。另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06 年研究，中国电子产业虽依赖外资代工（如富士康），但通过本土供应链集群化实现逆向创新：深圳华强北在 2003 年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的手机零部件生态系统，本土企业占据 PCB 板、电池等中游环节 70% 份额，为华为、小米的自主品牌崛起奠定基础。反观“殖民地经济”，本土企业仅能从事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



中国始终将外资创造的贸易盈余转化为自主产业链建设。2001-2010 年，中国累计投入 4.3 万亿元建设港口、电网和高速铁路（世界银行数据），其中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的 30 万吨级船坞（2008 年竣工）使中国造船业从散货船向 LNG 运输船等高附加值船型升级。2010 年中国造船完工量达 6560 万载重吨，超越韩国居全球第一。在通信领域，中国推动 TD-SCDMA 成为 3G 国际标准（2000 年），迫使诺基亚、爱立信等外企适配该标准。此外，亚洲开发银行 2010 年研究显示，中国在 2010 年前，就在东亚产业链中从“加工终端”升级为“集成中心”：2005-2010 年，中国从东盟进口集成电路增长 320%，加工后出口欧美，掌控设计、物流等高附加值环节。同期越南对华出口中 78% 为中间品，用于中国整车 / 整机装配，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的“嵌套式分工”。可见，**作为“世界市场”的中国，是全球化分工中的阶段性角色（代工），而非结构性依附。**

1994 年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包干制度逐渐转变为分税制开始实施的重要年份，标志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为了刺激资本主义化进程的前中期发展，通过将土地资源管理和以劳动力密集为特征的基础设施投资等财政权下放地方的方式，中央政府成功刺激了各省级行政单位在物质利益刺激下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市场、**通过土地的迅速私有化与此后持续超过二十年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扩张为起点建设了一个极为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然而，财权下放的同时也导致事权的下放，虽然这一时期的分税制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极为混乱的财政包干制度——这是一种近似于“财税联邦制度”的央地财政关系，各地的税收上交部分多以固定收入部分的固定份额为主，导致地方政府尽全力通过各种手段将收入从政府财税收入部分以私有化、社会募捐、特别基金的形式从应缴税账目上划去——通过 1994 年开始施行的分税制，中央虽然收回了部分对各地政府的财政控制权，确保了中央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但由于各级政府获得了除特定固定税种、增值税和其他几类消费税种外绝大多数财政收入的自助支配权，其不再需要像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前中期一般以花样繁杂、巧立名目的方式扩大财政收入，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发展本地经济而不必担心收入会流入国库、无法投资于本地并成为本地官员的实际“政绩”。通过将国税与地税区分并将绝大多数土地税收转入地方政府应用于本地财政预算的收入，辅以国有土地管理和经营权基本下放至各地方政府的措施，地方政府得以将全部土地增值带来的收入投入扩大再生产，这些政策与上一章所提到的广泛存在的工业品与传统产业供不应求与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产生了连锁反应：由于任何外国投资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金融业繁荣的期冀都有赖于高速城市化与对良好基建的极高需求，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成为全国各地所有政府机关“淘金”的行业，官员们疯狂地招商引资、鼓动政府内具有“良好商业能力的人才”“下海经商”，以期吸引尽可能多的外国资本来华，以全球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合作共赢的方式帮助他们稳固国内经济、并以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回击中国国内以工人阶级动员为主的一切反对力量。

在这些极其有利于外资进入中国的条件加持下，加以此时的中国如上文所述，是**全世界资本主义投资目的地的最后一片“完美净土”**，全球几乎每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的每一个产业之中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发达的一群企业代表都疯狂地在中国开拓业务，期待分得一杯羹。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外国资本对华年均投资额从九十年代末的三亿美元左右暴增至 2012 年前后的一百亿美元，且在此后长期维持在一百亿美元以上。由于外国投资伴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技术的应用（如高端装备制造、金融、信息技术及服务业）导致平均工业品价格指数相较于 1982 年的基准值 100 继续飙升，达到了 2012 年的约 280。这一现象被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胡锦涛与温家宝政府实施的四万亿元救济计划在经资本市场杠杆作用派生出的该年度新增约四十万亿以上现金流进一步刺激，形成了二十一世纪最初十五年**中国市场经济极度繁荣、经济极度过热的所谓“改革开放黄金十年”**。

由于各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与生产率提升，**传统的制造业产业工人逐年递减，以从事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蓝领工人和全体工薪阶层的数量却仍逐年增加**，蓝领工人人口更是在 2012 年达到了超过三亿——这是由于各类新技术、新产品生产线引入国内所创造的新型需求所导致的，以个人消费品、第三产业等新型需求产业为主。然而，蓝领工人的购买力平价工资指数（仍以 1982 年的基准指数 100 为基期）却在这一年降低到了不到 40，而全体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平价工资指数也减少到约 60（以 1982 年为基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随着依赖生产过剩与不均衡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代替指令性计划经济，工人阶级生产的工业品从通过平均分配的方式满足绝大多数人基本一致的工业品需求和消耗转变为在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剥削体系下展现出远远虚高于其实际生产价值的交易价**：随着全球人口在新世纪继续爆增，以欧陆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愈加旺盛，而他们同中国官僚的政治联盟愈发猖狂，**人民币同美元的实际兑换汇率**从 1982 年的约 2：1 暴跌至 2012 年的约 6：1，这一令人诧异的数字变化充分暴露了全球资产阶级伙同中共官僚以操纵汇率的方式剥削广大中国劳动人民所拥有的、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的每一分血汗钱，并将这一过程中获取的巨额利润全部转嫁到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头上了。

这一所谓的“黄金年代”的幌子更是**中共不断分化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巨大谎言**。中国政府通过**利用市场繁荣带来的金融机构扩张需求壮大小资产阶级和生活更加富足的工人阶级人口**（即“工人贵族”，其“富足”主要体现在工资高、工作环境较好，甚至工作时长会比其他工人都少些），并通过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确保一群绝对拥护中共官僚机关的**“中间阶层”群体**（即资产阶级学者常说的所谓“中产阶级”，不过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不构成一个阶级，而是同上述所说的一般，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人口构成）。仍以 1982 年为基准指数 100，中间阶层群体（包含收入较高的专业人员、企业中层管理人员、高技能工程师、高校和各类研究所科研人员与教授等知识分子，等诸多类别，涵盖工薪阶层中生活水平较优渥的工人阶级，从事小规模商业经营、零售、个体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小资产阶级，以及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行业内从事非柜台等服务性工作的脑力劳动类金融从业者，包括没有实际产权的基金经理、信托管理人员等）的收入指数在 1980 年代和 1990 这一经济动荡、社会不稳，工人阶级收入同比下跌超百分之五十的时期仅下降不到百分之三十。在 1990 年代中后期，由于中国政府这一阶段鼓励“高知工人”与“前国企、政府职员”“下海”及“青年金融人才”的政策，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应届大学生、前普通工人阶级纷纷选择加入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时的对资本主义市场极为重要的诸多金融机构（这一时期金融机构从业者由于资本市场起步导致的较高生活水平也是一大关键原因，1999 年金融业从业者人均收入较同期的熟练产业工人人均收入高约百分之三十），如保险业、银行业、各国家交易所等，以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所有者为主的城镇小资产阶级人口在 1990 年代末较增长到超过一千四百万，较 1982 年增长约百

分之八十到一百，而前述的脑力劳动类金融行业从业者人口则在1990年代末骤增至约三百万，较1982年（1980年代前中期，绝大多数金融行业从业者都集中在国有的四大银行系统，仍属普通工人，而到了1997年则已经有约百分之二十供职于私有的新型金融企业）的七十万左右有约百分之四百的令人震惊的增长率，到了2010年左右，狭义的脑力劳动类金融行业从业者已经超过四百五十万。在包括上述所有中间阶层的工薪阶级与自雇类个体户的统计中，大部分中间阶层人口的购买力里平价收入指数较1982年的基期仍有减少，只不过同产业工人骇人听闻的截止至2024年约20的指数相比，绝大多数中间阶层仍然能维持约75-80的指数，而金融业从业者的收入指数更是在2019年前后回升到了约100左右。截止至2024年九月，在中共大力鼓励金融业和个体创业者的政策推动下，城镇个体户、金融业从业者、自雇人员等群体所组成的中间阶层占总就业人口超百分之十五，具有一定的人口数量与类似的阶级利益。由于上述中间阶层相对于其他工人阶级更为富足的物质条件完全来自改革开放后较为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激发的城镇和金融、贸易等资本主义市场下的媒介型基础产业繁荣，**他们的阶级利益极度仰仗中共镇压工人运动并“维护社会稳定”**。中间阶层在这十年中的极速扩张与这一集团在各类社会群体，尤其是媒体产业中的大量存在，也创造了所谓“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显著提升”的谎言，事实上仅仅是一小部分掌控公共知识与发声渠道的中间阶层生活的相对生活质量显著改善的假象，与之相对的是工人阶级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这十年中，如上文统计数据所展现的那般，所受的无尽剥削与压迫。

“世界工厂”牢头的抉择

工人阶级迎来了十年苦难，而试图将中共在消除其阶级意识与党的政治独立性后让位于行政机关和官僚科层制的进程也同样迎来了彻底的失败。由于中国当今政府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经济建设和民生发展（尤其是对上述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扶持）的成功，也同样来自中国解放战争以及革命建设时代遗留下、得以团结广大劳动群众的巨大威望——这一威望完全归功于广大工人阶级党员与群众的政治与经济参与。显然**在基层群众的心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绝对无法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赋权的**。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愈加猖狂的资本主义市场剥削、压迫下（先前触目惊心的数据已然证明了这点），一个缺少健全基层党组织的中国政府更没有能力在缺少了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光环”庇护后，依靠官僚机构与隶属于新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如二十一世纪大量涌现的企业商会，各地方私企的行会等）完成对地方群众与乡镇地区的政治统合，尤其是在这些资产阶级团体已经发展出自立意愿，经常性同外国资产阶级沆瀣一气，利用一部分追求更多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动员与罢工等事件要挟中共向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者“放权”。

2012年前的中央与各地人民代表大会与今日不同，其仍然能够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

中国土地上有巨大缺陷的资产阶级立法工具，通过发表公开言论、各类议案、进行对政府机关的监督与调查等手段动员群众力量对中共构成一定压力，中共在此时为了安抚外国资本和同国际资本合作所必不可少的本国资产阶级仍未完全掌控全国各立法机关；以许志永事件为例的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后期爆发的诸多事件都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民主化诉求和工人阶级的经济诉求被国内资产阶级通过人大、政协或是境外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污名化为“反共反华”运动并试图以此向中共施压，要求其交出更多权力的方法。**对于新产生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而言，中共的机关就是一个“尾大不掉”的无用机构，一个所谓“完美”的资本主义体制和资产阶级并不需要它，而是希望借用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机关”，彻底瓜分中国的一切经济利益并防止一个对全社会一切方面有着强大渗透能力的中国共产党掣肘他们的食利——毕竟，这样庞大的统一国家、统一政府和统一政党可是随时拥有撕破同国际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一切联盟并寻求争霸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由于工人阶级的动员还不够强大、小资产阶级提出的政治纲领还没有触及中共中高层官僚们作为一个管理全国的“高干特权集团”存在的根基，中共中央的领导们还能容忍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融入全球资本主义潮流而带来的工人阶级动员扩大与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然而，随着国内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其愈发猖狂，甚至有妄图干政的行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愈发明显地期望通过国际金融资本势力颠覆中国共产党党员操办下的国家秩序、肢解或半肢解统一的中国国家官僚机器以增强欧陆和英美资本对华经济剥削的力度，而工人阶级又随着经济剥削的愈演愈烈加大了动员力度，中共各级机关在2010年后都逐渐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惧——中共与中国政府高层官僚自从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以来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稳固自身的利益，并确保“中国政府”这一大集体下每一个官员能够永远以“世界工厂代理人”或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好伙伴”的身份永持权柄：然而资本主义化措施导致的二三线城市没落和资产阶级实力壮大已经令许多地方党官僚丧失许多特权与许多利益，并正将矛头指向中央；北京的官僚们惧怕资产阶级有朝一日当真和“境外势力勾结”，从他们手中夺取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政治权力；他们同样惧怕那来自中国工人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滔天的怒火喷涌而出，吞噬他们自1982年以来努力打造的一切供自己坐稳位置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党机关内部的政治矛盾和危机首当其冲。中共在改革开放前的以地方党干部为核心的执政传统以及数十年的宣传令中共党内仍留下一大批政治上虽然极度懒散，完全不愿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于党的机构强烈守旧、坚定捍卫自身政治利益的所谓“老干部”——这些官僚往往存在于并未受益于改革开放，而是沦为输血机与劳动力储备区的各省份，尤其是因改革开放初期因廉价劳动力需求而被迫去工业化、摧毁经济基础的东三省，以及结束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后依赖沿海地区经济支持、经济迅速衰退而导致大规模人口和就业岗位流失的山河四省、华中南地区等——由于改革开放后北京的中央政府长期施行经济发展优先、政绩评估与升迁同经济挂钩的方针，尽管这些地区的官员能够因广泛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债务扩张而发展本省的资本主义

经济、通过招商引资与扩大债务的方式创造经济增速，但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数字显然在华东、华南的对外贸易区面前黯然失色，而这也导致这些省份的官员往往只能在地方的省份内做到较高职位而很难升入中央，除非能够主管某些重点的国家工程、国家工业项目、创造落后地区因特别因素导致的极大量经济增长、在经济以外诸如少数民族治理、统战或是文化与社会稳定等方面有极为突出的成绩而被作为中央政府成员候选人调入广东、上海等地区主政作为前置考察，进而作为高级专家、专业领域技术人才或经济学者进入中央政府；如果满足不了这些条件，就算一个中共官僚已经是省级领导官员，其也很难离开现任进入中央，这样的现象逐级下沉，导致许多市级、县级官员都因为缺少空位而升迁无望。显然，袁家军、胡春华这样的翻身咸鱼属极少数，而真正具有技术能力或自身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中共官僚在这一时期更是凤毛麟角。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市市委书记是国家领导人储备岗”、“江浙沪地区主官最有希望当主席”的种种刻板印象更加印证上述政治现实，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往往因为中国政府金字塔结构的天然倾向与种种不均衡因素长期呆在同样的岗位直至退休。



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坐同一把板凳的现状只会导致**地方官僚的权力集团愈发集中于某些个人**，反而扩大中国经济较落后地区政府权力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渗透，造成招商引资等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常规商业行为与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深度捆绑——这些地区的地

方官僚一方面不可能通过稳健的经济发展像他们的上海、广东同僚一样升入中央，又亲眼看到在**沿海地区资产阶级壮大造成的政府权力流失、地方主官甚至需要和资本家“共治天下”**（比如蚂蚁金服上市事件之前的马云及其资本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江省官僚集团完全依赖于其经济贡献，不过这些官僚并不害怕，因为他们可以迅速因为经济发展的政绩而进一步青云直上），进而被激发出失去权力的深刻恐惧，自发甚至自觉地操纵行政手段扼住资本集团迅猛发展的可能性，通过培养贪污腐败的手段将新生资产阶级关进政府权力的牢笼，通过将资本发展的节奏与资本家主动令官员受益、帮助其巩固权力的腐败行为挂钩，地方官僚得以大权在握，成为一省、一市的“土皇帝”。而由于北京政府在此时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数据提升的态度，贪腐官员就算是造成了天大的社会不稳，只要其事态不超出一个地区或省份的边界范畴，其就几乎不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最多也只是平调雪藏而已。在这一时期，北京政府为了安抚进一步升迁无望的地方大员、加速资本主义市场的建设，往往采取近乎北洋军阀与国民政府时期“笼络地方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治联盟态度，地方官僚的无法无天令人咂舌。

这些较为落后地区的腐败干部虽然直到习近平上台前都不被重视，北京政府也对他们的贪腐行为听之任之，但是他们却同时能代表改革开放后中共在较为落后的省份内基层治理体系内影响重大的一环。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新常态意味着这些官员所管辖的、庞大的地方公务员体系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共执政集团内的一股庞大趋势。如果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北京的中共中央将在许多省份内不再能够确保政策能够深入地方。在中央层面，邓小平等人可以通过“中央顾问委员会”等特别机关实现平缓过渡并建立新的权力交接体系，但是在中国如此庞大的地方政府中，他们完全无法做到任何“和平交接”——尽管经历过毛泽东时期的官僚一波一波老去、退休，但是他们只要仍在任上一天就必然会因为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阻止任何动摇官僚特权的改革在不伤害资本主义市场的情况下深入地方（为了维护自己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外国资本家面前的“开放友好”形象，北京政府根本不敢深究此时与资产阶级深度绑定的地方官僚，更是不敢树立任何可能破坏根基未稳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改革），而他们的“接班人”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他们“先辈”们的宗旨，**尽全力防止改革开放造就的新生资产阶级过度干涉党国内政与地方机关的治理体系**。正如先前所论述过的，市级以下的各基层单位的党政划分并不清晰，县委书记与基层各单位（村委会等）书记、主任基本隶属于党务官僚的范畴，虽然权力较大、级别较高的地级市和省份主官能够通过贪腐的手段维护权力，而上行下效，导致在市级以下的广大县、乡、镇地区也出现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导致的贪污腐败以及由这些现象支撑的地方政府权威幸存，但资产阶级壮大与上级单位要求扶持民营企业的政令也确实导致他们丧失许多改革开放深入地方前八十、九十年代时所拥有的裁定权，而不得不与外来投资者与资本家协商本地发展事宜，许多2000年前后的影视作品中所体现的“官商一体”、“容纳资本”等情节正是反应了这样的时代背景。不仅如此，贪污腐败横生虽然抑制了资产阶级绕过中共官

员建制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也同时将地方政府的物质利益置于资本家的经济活动与黑幕交易之上，变相地促进了资本集团以另一种方式渗透中共的党和政府机关。

这一现象同中国县、镇级官僚数千年以来作为“父母官”维护自身权威与统治力的阶级利益严重冲突，进一步刺激各地官僚的严重不满并导致中共基层控制力减弱。在2010年前后，有许多反对江泽民、胡锦涛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共内部反对派都曾试图利用各地党员与干部对这一现象的不满大做文章，其中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在重庆妄图通过动员并控制群众运动唤起工人阶级对过去工人国家时期的怀念，进而巩固自身民众支持并要挟中共中央选择他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前任重庆市委书记，“太子党”成员薄熙来。薄熙来是中共内部保守派干部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元素与“父母官”身份糅合的代表人物，曾在重庆主政期间尝试打压外资与民营资本的无序扩张并重建国营企业的关键主导地位，并得以号召一系列重庆辖区内的地方官员效仿。**尽管薄熙来在党内斗争中败于以习近平为首的诸多其他意识到他动员群众行为所具有的巨大不可控因素的官僚，他所引发的诸多政治事件仍然成为一个分水岭，既将中共党内斗争日益扩大的风险暴露在全中国人民面前，也另愈发恐慌的许多中共官员意识到即刻更改航线迫在眉睫的必要性。**

上述的腐败问题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果而进一步扩大。由于分税制的逐渐落实与固化，中央对经济较好、经济责任较高的许多



地方政府的掌控随着财权转移与地方政府对大多数行政事务所属事权的全权负责进一步弱化。分税制明确将税收收入按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却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这种“收入中央、支出地方”的格局导致上一周期的地方财政收入往往不足以覆盖下一周期庞大的支出责任，从而迫使地方政府寻求其他融资渠道，如加大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各种地方融资平台的依赖。地方政府在自主筹资过程中的行为极大增强了其财力和决策自主性，但是也极大刺激了各级政府对当地资本家和民营企业的依赖性，直接增强了各地资产阶级对政府财政政策的直接影响。先前所提及的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 4 万亿刺激计划，催生了地方大规模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化解政府入不敷出的现象，但是也创造了大量新的公共债务，为未来激化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矛盾埋下引子。自 2010 年起，许多地区的地方债务总额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2010 年已达到百分之十五左右，而隐性债务规模远远超出公开统计数据，根据一些估算后累计可达到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些地区有的是改革开放的重点实验地区，有的是内陆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无论如何，地方债的炸弹只能通过滚雪球的方法解决，也就是不断扩大新的政府投资、创造新的经济需求、以一笔债务化解另一笔债务、以新投资化解现有投资所需的收益。这一切投资需求须依靠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重点地区的“龙头产业”扶持，比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万科、恒大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他们依托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通过社会融资、贷款与先前政府公债的叠加掀起一股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带来中国长达十几年的高债务、高投资、高回报经济增长。显然，这样极度依赖企业和政府社会信用的举债型经济发展模式是需要某种庞大的社会力量为其背书的——这一力量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性扶持与鼓动，在 2010 年代风靡一时随后暴雷的 P2P 个人贷款时间也是这一资产阶级头脑过热的副产品之一，很好地阐释了这种**举债型经济模式极差的稳定性与不持久性**。就像 P2P 必然因为坏账而爆雷，地方政府一环套一环的公共债务扩张也随时随地都处于危机之中，这就导致他们不得不通过更大的注资实现债务抵消、维护体系。不过，此时的中国社会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高涨的热情和极好的预期，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满怀赚的盆满钵满的期望，随时准备吃的满嘴流油——不断扩大的公债和基建扩张象征着投资机会、象征着利润，而资本家必然会哄抢利润。巨量企业在政府的包装掩饰和积极预期下对这些投资机会的争夺创造了更多地方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进而形成又一个恶性循环，创造中共执政危机到来时有一个巨大的“薛定谔的原子弹”。

与这些往往被称为“保守派”的贪污官僚相对的，是在华东（如江浙沪）、华南（如广东）等改革开放后迅速自由化、对国际资本门户大开省份主政的官员。在这些地区主政的官员因为中国政府举全国之力创造的资本主义金融、工业窗口，可以通过更为“健康”的企业真实盈利而产生利润，并不需要触及其他地区那样危险的债务炸弹，他们往往能够直接从看似繁荣、稳定的资本市场受益，而资产阶级扩充实力所创造的经济增速也能直接折算为“有效政绩”，助他们在青云直上的仕途一臂之力。这也是上海、广州、

深圳等地区看似“贪腐”官员较少的原因，实际上，**资本主义市场对工人阶级加大剥削的行为能够直接扩大他们的阶级利益，这些官员当然不需要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官员一样额外贪腐**；除此以外，他们也不需要为扩大自身政绩而增长的地方债务炸弹而负责。无论是违反资本主义法律的贪污腐败，还是任由资本主义无序扩张、剥削工人的所谓廉洁官员，其本质上都是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机器与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血汗牟利，只不过方法不同、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维稳和动乱结果不同而已。然而，**这些地区资本家的自由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能够通过**与这些“门户开放”与“自由贸易”地区资产阶级的经济往来，培养起逐渐支持欧式、美式自由主义、反对中共统治的政治力量。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些物质基础的发展更加依赖自由主义市场规则，就连中共官员的升迁也取决于资本家生意好坏的地区，令资本家更为舒适的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和所谓的“小政府”模式（所谓的“小政府模式”和任何资产阶级专政制度都没有区别，本质上无非是通过缩小政府与国家机器的公权力将更多可供资本家牟利的公共领域投资私有化，以减少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权力这一资产阶级之间的公共契约的方式加强资本集团的独立权力，这同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是同样反动的）自然能够慢慢取得支持，就连在中共政府内也出现了汪洋、杨雄，以及上文提到的胡春华等曾在改革开放关键地区任职而支持进一步放开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经济和行政控制、加速资本主义扩张的政客。**这些政治集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或“自由派”，而只是改革开放重要节点地区物质基础变化的自然产物，尚不能够对中共的执政根基造成迅速的深刻改变**，但广大中共公务员就算不明白水滴石穿的道理，也能感受到、预料到资本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领土上继续无序扩张对社会稳定、对他们渗透社会的行政机器能够造成的破坏。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内因不同的阶级利益导致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重要节点，一个如果不迅速转变则必将令外部帝国主义势力有机可乘、像面对袁世凯北洋政府时一般激化中国的地方主义倾向，进而造成全国的政治分裂与动荡——处于两个互相对立的极端位置上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内的“建制派”，他们希望通过维护个人权威与经济腐败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以及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党内自由派”，他们直接从资本主义市场的繁荣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壮大而收益，希冀进一步“解冻”**。然而，正如上文所说，他们能代表的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两个极端”。与这些人相对的重要政治势力是上文一直没有机会谈及的另一群“公务员”——“务实派”**技术官僚**。如王沪宁、陈吉宁、袁家军等高级知识分子、中央部委官员或先前提到的“重要国家工程”负责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务机关的负责人，如各地与中央政府内的中共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以及在改革开放前中期被“边缘化”的各省市中共党委书记。与那些直接参与政务和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事务官员相比，**这些专家往往更加难以同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市场产生直接的物质联系，他们的阶级利益更加直接地反应在中共作为一个执政集团的稳定存续上——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作为中共治国体系**

的一份子，维护整个政府的稳定运行。无论是陕西的贺荣，还是来自华东、华南的韩正与李希都基本能代表整个“务实派官僚”集体，他们看的比“保守派贪官污吏”与“自由派中共人士”都要更远一些，既能够认识到一个稳定、有条理的资本主义市场对中共巩固地位的好处，又能够明白中国共产党过度放弃公权力、迎合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必然带来的执政危机。事实上，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中国政府内“公务员”的阶级利益的集体，恰恰是这个“务实派官僚集团”；在任何政府内，占据绝大多数的公务员都是行政办公人员以及身处基层、完全没有能力干涉政务决策，他们不可能像贪官污吏一般以权谋私，更是一辈子无望升任中共体系内处级以上领导岗位。这些公务员真正构成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内“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既不想看到资产阶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进一步夺取他们手中本就微乎其微的权力，更不希望中共因为外部势力干涉而自毁前程，砸了他们的“铁饭碗”。正是这些占据中国政府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公务员们作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高级政府职工追求社会稳定、保全自身利益的集体发声，才促使了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调转方向。

似乎是迎合了他们对社会不稳的恐惧，工人阶级反对剥削压迫的动员也在2010年后不断激化。中共在1980年代重建资本主义至2010年前中期这三十多年的政策基本完全忽视了工人阶级任何增长物质利益的诉求，尽管保留了诸如普遍的社保、医保与低收入群体较低税收等政策，但是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与物质生活较1970年代末逐年下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在这三十年间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展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以巩固自身作为一个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波拿巴主义集团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对帝国主义势力与国内资产阶级一再缓和，不断向他们的许多诉求屈服。然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这个成为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府尚不足半个世纪的统治集团在此时已逐渐慢慢意识到国际资产阶级吃人的本性，他们若是想要当这个“波拿巴主义的居中仲裁员”，那么就绝不能放任资产阶级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无序扩张，尤其是当这一扩张已经威胁到中共自身的统治根基，动摇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与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的团结。中国政府必须中国工人十年以来由前所未有的经济压迫所带来的，愈发无法压制的滔天怒火泄至他处，更需要重新缓解党内矛盾外溢的巨大风险。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的中国工人集体罢工事件数较2011年增加将近整整一倍。

正是在这样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务实派”将很快夺权，组成“习近平集团”的领导核心；而政府内“沉默的大多数”将组成其最坚定的政治基本盘。同“邓小平理论”的全盘解冻与胡锦涛时期的“温和自由主义”政策分道扬镳的时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慢慢成型。

北京的阴谋家

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由胡锦涛及其“党内自由派”政治

集团的操纵下，以“温和”形象自我伪装的习近平以及新一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被代表中共各地党员和官僚机关利益的党代表们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指导下被确立。习近平在2014年以前曾被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内外不同政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中共领导人、海外自由派、前民运人士、诸如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等反中共的宗教人士等）广泛认定为“改革先锋”、“民主卫士”，期待中国在习近平的“带领”下继续深化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持续并加强与国际资产阶级利益接轨的诸多国内政策；当时，绝大多数海内外自由主义者都认为习近平的上台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掌权者们愿意进一步向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妥协，继续实现中国的自由主义建设和资产阶级以同政府直接协商的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成为真正的国际资本之天堂。然而，**自由主义者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官僚机构运行的内部逻辑——中国共产党并非民主议会制度中的党，其党内官僚的升迁与履职并不依靠“个人魅力”或“人设”，而是依靠政绩与顺从整个政党的机关通过其有机的执政网络于无声之中做出的集体决策。**正如在上文中已经反复提及的那样，自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全速推动资本主义复兴、彻底削除中共作为“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意义以来，公务员与政治家在共产党的党统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合署机构内浑然一体，**改革开放后的中共绝非一个政治上持之以恒、坚定理论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任何据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们在资本主义重建后的中国都只需要坚持一条永恒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左右摇摆的“实用主义”本身。**习近平的所谓“亲民主自由主义”态度是由全中国与执政党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倾向渲染的，是官僚们通过紧锣密鼓、环环相扣的执政机器，以海量文书行政工作与政治指导方针，在全国暴力机器支持下得出的政治道路，这与任何个人的政治抱负或理论偏好都几乎毫无关系；或许身在北京中南海的几位大领导能够对这处国家机器的最终面貌打几个补丁，放上几块好看的牌匾，但最终，中国共产党把握地方实权的一切行政领导干部的唯一核心纲领，就是作为中共官僚整体的一部分忠诚地反映并执行这个机体通过上述的一切方法以集体思考下达的集体结论。很明显，既然亲自由主义的态度与一味迎合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威胁到了这一执政机体的存续本身，既然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独立代表们已经开始公开发言、试图借用本国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通过仅存的民主议会制度直接凌驾于政府的诸多秘密之上、指挥这个执政党和政府的施政方针，那么这些噪音当然不能被允许存在下去。官僚集团的恐惧浮出水面，而如薄熙来等令恐惧继续深化的“鼠目寸光之辈”已经被执政党的自我清洁机制所击垮，那么习近平和整个中央自然不可能延续那上个十年的政策。

比起他的前辈，如胡锦涛和“团派”，**习近平无疑是更加灵活的政客，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整个执政党内深深的不安，更能够意识到在国际资本主义于中国盈利的背后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已经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和破坏——2014年前后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罢工斗争运动的高潮，而这样的运动又和不在安分的国内资产阶级企业家们联动，对中央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胡锦涛和他留下的老“自由派”班子没能认识到

这一点，他们仍对帝国主义势力抱有侥幸的妥协心理，认为通过适当的政治、市场经济化与言论管控的宽松能够换取一些喘息的时机；然而正如我们早就论述过的，中国的国内局势与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尖锐的矛盾早已不允许任何缓和的空间——就像



1914 年的欧洲那样，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爆发已经迫在眉睫，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一般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源持续被剥削、希冀获得本土工业化的目标与中国因生产过剩而竭力寻求新市场、输出劳动生产力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在 2010 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促使中国资本涌入亚非拉地区进行投资，而这样的金融运作必然彻底摧毁欧陆和美国金融寡头输出矛盾、转嫁危机的根本方式——那就是以欧元和美元，以伦敦、巴黎和纽约为基础操纵全球货币的新殖民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当新旧两种资本主义处于利益完全针锋相对、且任何一方的失败都将导致其统治阶级彻底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帝国主义统治者们自然也就失去了任何妥协谈判的余地。这一历史轨迹将导致日后“全球不稳”的集中爆发。

不过，此时的习近平及其幕僚集团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仍然希望同敌对的帝国主义势力妥协而——**中国资本主义全力扩张的奋力一击要等到中国国内矛盾与中共改革彻底失败，中美之间彻底脸皮。**2012 年的习近平及其集团虽然是骗过了胡锦涛及其背后依赖上海与广东金融资本支持的“团派”和“新上海帮”，以自由主义倡导者的形象登上中国政府的第一把交椅，但其本身也不是什么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或“反西方派”，

而是如上文所说，只不过是代表“务实派”或“稳健派”官僚阵营的一群阴谋家。此时的习近平无非是想要以改革的方式缓解国内矛盾，以一种更加稳定、自主的方式在更为安稳的国内环境下同外国资本家“做生意”；尽管如此，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无论是无法缓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不断累积的国内矛盾还是新帝国主义争霸时代下吃人不吐骨头的资产阶级行动方针都不可能允许他们实现这样的夙愿。最终，这一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将在为期五年的内部改革和对外重新谈判策略失败后，走向全世界社会主义者最熟悉的一幕——帝国主义霸权。

走向帝国主义的充要条件——全面崩盘的国内改革

经过2012年到2016年间通过“反腐倡廉运动”以及各类通过中央以空间规模自上而下运用暴力机器整顿政府与党务机关、抑制资产阶级对执政体系渗透的尝试基本成功，习近平通过2016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代表党内广大政务官员与看似更加“保守”的地方官僚利益的政治集团似乎以自由派口中“习近平欺骗全中国人民建立极权统治”的方法再次“掌权”。从表象上看，随着“一带一路”策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术语出台，新一届中国政府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改革开放的西化大方针一下子转向为反对西化、重建宣传口径上对“党”的强调，希冀通过重建一个去“国家化”、无需“算经济账”的执政体系帮助官僚在各社会领域从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权力——在自由派与新生不满的资产阶级口中这无疑是所谓“毛泽东回来了”、“中共倒退三十年重回共产独裁”的标志；但事实上，**这并非所谓“习近平背叛改革开放”，而只不过是中共官僚集体作出的自救选择——中共确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北京中央政府抛开“经济账”，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整合起来算一笔“政治账”、成为仲裁者，逼迫中国的地头蛇们在内斗而崩溃的阴影中悬崖勒马；而中共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也绝非什么“彻底掌权的起步”，而是中共内斗愈演愈烈、国内矛盾亟须立刻转移的标志。**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上文已经指出的一个观点，即**习近平及其政治力量的行为并不是所谓的政治前瞻性体现**。虽然革命共产主义者能够通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出官僚集团不断崩溃的必然趋势，但在邓、江、胡时代被包容扶持了数十年的中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归根结底是一个被中共培养扶植、没有任何强大独立力量，中共官僚对他们的恐惧更多来自对西方帝国主义介入中国事务、阶级矛盾不经缓解继续扩大，以及2010年后资本主义不断扩大所带施加的“未来阴影”，而不是所谓能够随时被“自由派”夺权的迫在眉睫的政治威胁——习近平集团和中共官僚做出回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内部的不安与恐惧所导向的自发行动，而非自觉的政治规划——中国的历史很长，同地方金融资本与“实业家”勾结而逐渐脱离中央政府控制，拥兵、拥权、拥地、拥金而自重乃至自立的官僚和“地头蛇”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大清帝国正是亡于

地主阶级和军官集团（北洋军阀等）的阴谋勾结，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正是由于地方军阀内斗、全国财阀资本家为牟取暴利而坐山观虎斗才能够制造出足以令其如此迅速就亡国的巨大危机；是历史的阴影导致中共绝不希望重蹈其资本主义先辈们亡国的覆辙。当然，自由派资产阶级不乐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一个强大的波拿巴主义中共集团能够对其产生远超完全依赖税收和贿赂支撑财政的国家化的中国政府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意见并不能产生什么关键作用。他们虽然渗透了中共的执政机器，但是截止 2016 年他们仍需附属于更广泛官僚 - 资产阶级集团的小阶层。因此他们自然也可以迅速被重新打压，纳入官僚的全面掌控之下，再次成为更彻底的、辅助中共官僚集团掌权的工具。

许多自由派和欧陆与英美学者、政客使用“习核心”、“习近平集团”、“习派”等词汇指代随着习近平上台而“掌权”的一股政治力量，包括但不限于习近平主政福建、浙江时期的“属下”。这一说法当然有迹可循，毕竟此时的中共中央为巩固权威、加强信任，必然需要一批拉帮结派、称兄道弟的政务官员执掌全国事务，派系政治和山头主义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执政联盟通过国家机器划分势力范围、巩固自身物质利益的方法。只不过，这种说法把中共的最高权力机关降格为仅仅是一群通过“仕途”走上个人成功道理的官僚结盟的小圈子堂口，而彻底忽略了中国共产党体制本身为习近平执政赋予的“党内法统”与“政治支持”——简单来说，就是一群官僚为了维持自身的政治权力动员起来支持习近平执政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中国政府的国家机器层层渗透。

于是，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在党组织建设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新政策。中共不再追求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党政分离与中共的橡皮图章化，而是完全接纳了党的国家官僚化，并试图通过一个看似强大的党的力量，将整个政府融入党的管理体系。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地方的主要行政事务往往由市长和“政府官员”而非党的书记这类“党务官员”操办，著名案例如山西省大同市前任市长耿彦波，上海市前任市长韩正等，都是在任职市长期间取得突出政绩、主管辖区事务而党委书记并不占据重要政治位置的代表人物。（韩正在 2017 年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这里指代他任职上海市市长的 2010 年前后；即使是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后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韩正也因为上海在改革开放中的特殊位置，在任期内对实际政府事务的直接掌握低于其上海市市委书记任期内的上海市长应勇、杨雄等）。党的书记和事务官不再有任何政务官与事务官意义上的差别，而彻底成为了公务员仕途的不同升迁阶段，中共给这一整个进程打上了所谓“党指导一切”的大旗，妄图通过复兴对毛泽东时期党务机关崇高地位的追忆而赋予根本意义完全不同的党国一体化合法性外衣，以政治威权的中共统治全国。不过，一个政党的存在需要一定阶级的稳固支持和一种基于阶级立场、能够团结全党的真正的意识形态，而当前阶段，中共作为一个实用主义为体的政治机构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它既无任何意识形态魅力，也无法从政治性角度直接团结任何阶级；因此，

中共只能通过在中央与地方高级别行政主官中扩大“讲政治的技术专家”（这些人选能够给绝大多数中共官员带来“可靠掌舵人”的印象），在地方上增加党的规模（截止2024年的超过9700万党员）以尽可能地笼络更多不同阶级与集团并保留甚至增加市级、县级主官中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与其他“政治色彩较弱”的公务员数量以抑制老派保守官僚的贪污或迂腐作风、维护稳定，但这反而进一步导致党员与官员之间的差异过大，阶级成色、出身背景五花八门，这些人的唯一共同点是对“党”或任何意识形态没有任何信仰上的忠诚——他们要么是出于朴素爱国情感加入政府，要么就是完全为了追求个人仕途的机会主义者；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官僚国家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遂中央高层官僚们的心愿，因为一个无论思想还是成员的阶级立场都极度分裂的组织是绝对不可能维护其作为一个“政党”的独立力量的。正如我们在改革开放数十年进程中所看到的，党需要在城市不断创造新的资产阶级，并在农村通过重新建立私有化与雇佣关系，加速人口的财富与阶级分化。失去强有力的工人阶级专政制度与基层动员能力的中共不得不在地方上采取和先前不同的另一种治理模式，也就是农村宗族势力和地区集团的卷土重来以及这些势力融入党国体系的过程——由于缺乏优秀的，愿意为社会主义理想做出贡献的青年干部与党员，中共不得不从利用其他方式吸纳新的党官僚。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与各省市区级地方政府的技术官僚也并未放弃通过各种手段对抗地方势力对行政机器的政治影响。地方官僚打造自己的“独立王国”的政治手段要么创造本地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通过类似中华民国时期晋系军阀阎锡山的封闭治理模式削弱中央对物质基础的直接掌控，要么是以拉帮结派等政治手段形成联合体。显然，中共拉拢基层知识分子集团、重新巩固地方政治掌控力的尝试缺少不了地方公务员体系的协调，因此直接公开矛盾并进行对抗是不可能的。针对此问题，习近平政府

使用了非常高明的手段，即其人上所开展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政策。通过纯粹的政策性帮扶，中国政府鼓励较为发达地区的企业进一步向欠发达地区大额投资，并将落后地区的农产品以政府分工的形式派发购买份额予经济更为发达地区的单位和个人作为消费者，以此为基础扩大市场的消费能力，同时削弱落后地区的经济独立性，同时也拉拢了一部分农村人口并通过物质条件增长、经济发展的事实令许多地方官直接获益。改革开放后极速扩张的官僚行政权力与生产过剩问题通过乡村基础设置扩张与生产力转移的方式暂时得到缓解，这也是许多建制派支持者引以为傲的事情，即通过大量国家投资消灭短期贫困的现象。消灭贫困、提升农村和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以及推行通水通电通信号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准提升当然是革命共产主义者乐于看到的，但是一个对受剥削压迫阶级有利的事件未必是资产阶级善良的体现——相反，绝大多数这些事件体现的都是资产阶级利用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需求巩固自身权力的尝试——对于脱贫攻坚这一政策也是一样。由于政府强制干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公信力与执行力背书，在疫情后掌控力大为下降、债务危机爆发风险剧增的情况下，许多曾经建立起某些产业、被安排到某些“对口市场”的欠发达地区迅速面临产业濒临破产的窘境，同时，基础设施扩张并没有解决受剥削的工人消费动力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将一些农村的土坯房和瓦房翻新成现代化的公寓楼的确会让短期的财务报表更好看些，但住进去的人拿的是政府补贴、做的工作依然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在一开始，这样政府通过消耗国库延缓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方式还能暂时持续，可随着客观市场并没有得到有效扩大、工人阶级消费能力并没有提升，这样饮鸩止渴的方法带来的仅仅是债务危机进一步滚雪球、向内陆投资的企业愈发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

回到政治问题上的分析：正如之前所说，巩固中国的资产阶级官僚集体的运行稳定的一大“法宝”就是在已有的政府官员与完全拥护中共统治地位的城乡、城镇结合地区小资产阶级与农村的地方新宗族势力“地头蛇”中加速入党进程来创造一个看似辉煌的政党。这些势力的重建是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复辟所必然导致的，但是他们对执政体系自下而上的渗透与改造却是由中共官僚“开闸放水”所开始的——毕竟，在农村和地方政府管辖的广袤欠发达地区中所找出的“专家候选人”与“有志知识分子”几乎只能来自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随着愈来愈多这样的人入党、加入政府，他们背后的地方势力也加入中国的政治牌桌，中共意识到地方公务员与本地资产阶级沆瀣一气创造出的一批不受上级政府制约的资产阶级“独走”所带来的危害性，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一些新资本家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巨大冲突。应对这一问题，北京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尽量促进地方资本国家化、政府话，使各类资产阶级能够通过中共的执政机构加入政府，给予其物质利益进而要求其将资本掌控权的一部分交予国家监管，尤其是那些和地方公务员已经有人尽皆知的联系的产业。**例如，浙江省的许多新民营企业家、中小企业愈发疯狂地追求加入政协、人大等机关，而他们往往和某些“家族公务员朋友”有错综复杂的联系，这背后的原因正是中共不断干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发展轨迹，

通过增加对“爱国民营企业家”（例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策性支持，促使这些较小规模的资本家与他们达成政治协作，为中国政府装点门面。另一方面，中共急于在地方上恢复中国传统的“父母官”模式，逐步打破了公务员的地域回避原则，直到2011年仍然强调的同市出身官员不得在本地任职的规定如今基本成为废纸一片（这是当年北京政府对抗贪腐几乎唯一的有效方法，随着中共统治成本的暴增与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官僚短缺而不得被废除），诸如山河四省等难以吸引政治人才的北方地区地区、县级政府与党委中相邻地区或省内干部任职比例超过75%（2017年）；借助官员的个人威望以及朴素落后的、对于官员和执政体制的个人化认同，中共才得以在乡镇地区维持大不如前、难以为继的地方掌控力——以北京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进一步“隐性缩水”为代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虽然以“官二代”为代表的权贵官僚子弟因习近平集团上台后为平衡党内利益并提拔“稳健派”专家而消灭“太子党”后逐渐淡出政治核心圈（如内蒙古的乌兰夫家族彻底被空心化、排除出中共执政集团等事件），一批“出身高贵”的城市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得利益者集团却在习近平对这类主要为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僚的需求下掌管了主要的中央权力和升迁渠道，使得地方势力依旧难以进入党的中央治理机构。这一现象刺激地方官员要么铤而走险，面对北京政府“反腐倡廉”运动清洗官僚队伍的威胁依然选择与宗族势力和地方资产阶级集团通力合作，继续巩固这些社会力量通过官僚个人对整个体制的影响力，导致地方主义的利益集团规模进一步扩大；要么彻底不再有上进心，不再追求“吃力不讨好”的政绩——2018年以来全社会对公务员“铁饭碗”的追捧与强调无疑证明公务员作为稳定收入职业而非追求政治权力场所的属性扩大，这样的属性将被经济危机的弥散进一步强化。

无论是“十八大”以后“不收手、不停手”的腐败官僚，还是因为中央政府的维稳与调和利益措施而放弃“上进”、懒政的官僚集体，其都能代表中央与地方政治目的、物质利益的不一致。由于地方强力集团的介入、非党力量的干涉以及官僚体制在自我清洗政策下导致的动荡，中共愈发难以作为一个拥有超然地位的政治实体掌握国家。**中共尝试将极度庞大的资本主义行政体系融于自身的尝试自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失败，北京的中央官僚们完全忽视了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与庞大的资本主义市场对波拿巴主义政党强大的渗透能力，结果只能是其被中国庞大的地方政府体系彻底反噬，越来越丧失其独立性。**在许多县城政府与地方党委，中共与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要么成为宗族势力，城乡资本家与政府官僚“角逐权力”的战场，要么成为地方“懒政不作为干部”的茶话大会。2016年后的中共完全体现了中国国民党在1930年代的特征，这一进程可以总结为“共产党的国民党化”。随着传统的党权与国权、地权界限丧失，地方执政机构彻底丧失意识形态热情的驱动力，“党和政府”在中国十几亿民众心中的地位要么沦落为旧社会走“仕途”的“官场”，要么沦落为“衙门”，而

非那个改革开放之前，笼罩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官僚集团对广大群众的号召力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外衣治下，掌握国家每一个政治齿轮的，具有超然地位的、拥有巨大意识形态驱动力和魅力的、来自革命时代之遗产的中国共产党。随着资本主义因生产过剩导致的周期性危机以改革开放繁荣时期地方投资与债务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的方式集中爆发，各级政府的财政储备与商业信用又面临崩溃，地方官僚只能进一步向资产阶级集团投降或是彻底“躺平”、期待安然退休。与此同时，北京竭尽全力想要维持的强大中央又与渴望更多政治自由与自主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形成不断扩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这体现在资产阶级资助下广泛出现的自由派公众人物与媒体平台上“谏言良多”所谓知识分子。**随着不可避免的政治矛盾扩大，同床异梦的中央与地方党政机关亲眼看着矛盾正吞噬全党——自习近平上台后从未停歇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与官员落马正是这种对抗的外化体现。**随着中共的政治斗争随着权力的重新洗牌与对地方政府控制力的争夺而不断激化，不同派别不断降低底线，加大这一你死我活的资产阶级内斗的力度。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代表的就是这一大背景下，习近平及其所代表的技术官僚集团尝试通过镇压党内矛盾、整合中共作为执政集团的阶级利益，并通过行政机器与党内清洗继续树立控制力的尝试。

上述的事件随着中国在 2017-2019 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妥协、随后被第一届特朗普政府背刺，以及房地产泡沫达到高潮、中共反贪和中央政府加强治党引发的党内矛盾激化导致政治危机和生产过剩问题在 2019 年达到顶峰——这些危机总爆发的前兆无不向中共和北京的习近平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共的统治危机已经无法用内部改革和经济充足的方法解决。中国若是想要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强有力的一份子生存下去就必须寻找另一条出路，一条国门外的出路。**这条寻找出路的过程是缓慢的，最早从 2013 年“一带一路”的概念被提出而开始，随着内部危机的扩大而愈来愈被重视。显然，被剥削压迫到喘不过气的中国工人已经无法被压榨出更多利益。于是北京的双眼望向喜马拉雅山和五湖四海之外——那是追求帝国主义霸权、追求“世界民族之巅”宝座的道路。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随着中国国内矛盾的不断累积，再一次出现在亚细亚东部的平原与丘陵上。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并不会因民族与国家旗帜的更换而改变其本质。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将目光投向国门之外，寄希望于以海外扩张、资本输出和所谓的复杂战略布局化解内部矛盾的累积。这种转向并非偶然，而是由中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困境所决定的：国内市场持续疲软，产能严重过剩，地方债务如山压顶，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停滞不前——一切迹象都表明，统

治阶级必须寻找新的利润来源与新的矛盾阀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赋予了某种神圣使命。它不仅是一个国内民族主义的动员口号，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格局下一切对外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总称。中国政府将这种战略粉饰为和平崛起、合作共赢、互利互信的“新型国际关系”，然而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政策与百年前列强推行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并无差别——**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海外投资、军事存在与外交攻势，不过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争夺更高利润份额、确保关键资源与市场通道的手段；它的代价，则是迫使中国工人阶级为这一套帝国主义工程支付劳动、生活与权利上的成本。**

然而，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百多年前的德意志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不是列强在“上个多极化世界”里肆意瓜分殖民地的那一幕。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数波全球化浪潮之后，世界资本主义早已从列强间的争霸与瓜分，转化为以美帝国主义为核心的全球体系之下的利益交换与局部博弈。无论在亚太、非洲还是拉美，资本家阶级和各国统治集团之间的合作与勾连远多于全面的直接对抗，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政府，正如本文前篇的结论，更愿意充当全球资本的“代理人”，“管好、镇压好”近十亿中国工人阶级，把这个庞大的人口与劳动力市场稳稳锁在资本主义秩序之中，而绝不会为了中产者与小市民（即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等社会群体）幻想中的帝国主义霸权去冒险博取新时代的全球霸主宝座。

这并不是说中共无意进行资本输出或全球产业布局——恰恰相反，它必须这么做来缓解国内危机。但这些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将自己捧上资本主义世界的顶峰，而是向欧美的“洋老爷”们展现自己的统战价值：“你们看，我替你们管中国、管亚洲、甚至管非洲都管得井井有条，你们可千万不要把我当成敌人。”可惜，这种讨好换不来安全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根本无法允许他们为一个中国代理人让渡哪怕一些象征性的利益份额。**于是，中共在现实中既要维持与全球资本的合作，又被世界局势与国内民意的双重压力一步步推向那看似强硬的道路——一条充满姿态与口号，却从未脱离资本主义利益积累之原始逻辑的道路。

我们将沿着这一现实展开分析：首先揭示中国资本对外扩张的经济意图与其帝国主义性质；其次剖析民族复兴意识形态机器在国内外的双重作用；最后对习近平路线的“强硬”表象与资本主义懦弱的本质作出评判。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将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复兴，也不是民族的复兴，而是资本主义中国在全球资本体系中的一次全新升级——而中国工人阶级要走出这条日益暗淡无光的死路，唯有依靠独立的政治力量与国际主义的团结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带一路”——中国帝国主义的双重性

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逐渐崩塌。三十余年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全球需求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冲击下，暴露出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债务累积等一系列无法用常规政策调和的矛盾。钢铁、水泥、造船、家电等行业的闲置产能长期高企，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严重，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和举债投资的模式早已摇摇欲坠。即便是被奉为经济奇迹样板的沿海制造业集群，也在产业链重组、劳动力与生产力过剩与市场萎缩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下遭遇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的困境。在这样的国内与国际背景下，中国资本的对外扩张代表了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这样一个依赖资本积累维持政治合法性的政权来说，外向型资本战略——**将剩余资本和过剩产能输出海外，争夺新市场和新利润来源**——便成为唯一可以延续统治稳定的选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早已证明，当内部市场无法支撑积累速度时，资本必然会将触角伸向国境之外，通过投资、贷款、贸易、技术和军事的综合手段，把利润来源和积累空间转移到外部。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格局中，重新

走上了列强百年前走过的道路，于是，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了这一转向的集中体现。

中国政府宣称它旨在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但细究其运作逻辑便可发现，**这是一个由国家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承包商、能源和运输垄断企业、以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民营资本共同运作的资本输出平台。**资金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机构以贷款形式流向目标国家，附带长期偿还义务、资源优先采购权、项目由中方企业承建等条款，确保在项目周期内为中国资本创造稳定回报。以2013-2023年的官方数据为例，中国对“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2400亿美元，其中70%以上集中在能源、交通和资源开发领域，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中国国内产能严重过剩、需要外部消化的行业。这些“一带一路”项目的具体内容往往以大型基础设施为主——高铁、港口、能源管道、矿山开采、光伏与风电园区等。例如在东非，中国承建并融资的蒙内铁路（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与港口蒙巴萨）造价38亿美元，其中90%的资金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且明确规定承包、设备、施工、管理全部由中方公司负责，连轨道铺设与列车运营人员的培训都由中国企业垄断。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更是典型案例：项目耗资15亿美元，由中国贷款融资，但由于“港口在前期缺乏足够吞吐量带来的收益无法偿债”等理由，最终**斯里兰卡政府在2017年将港口及其周边土地以99年特许经营租约的形式交给中资企业运营。**这不仅意味着经济控制权的转移，还为中方在印度洋关键航道上获得了长期立足点。

中巴经济走廊则在能源与交通领域实现了深度绑定。中国投入超过600亿美元，涵盖公路、铁路、输电线路和多座燃煤电站。这些电站长期向中国国企供应合同锁定的煤炭和设备，发电后的电力供应合同也保障了中方投资回报。然而，这类项目在巴基斯坦引发了电价上涨与债务依赖的批评，同时，巴基斯坦的国内产业链被中资高度占据，导致本地企业和劳动力被边缘化的情况十分普遍。类似的模式在赞比亚、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国反复出现：中国贷款与承包商捆绑销售，确保资本、技术、利润循环在中方体系内部流转。**缅甸皎漂港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案例也完美体现了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战略渗透的模式。这两个港口都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关键项目，为中国提供通往印度洋的战略出海口，绕开了马六甲海峡这一咽喉要道。尽管这些项目的建设资金来自中国的贷款，但项目本身却规定由中国企业承建，并长期由中方运营。例如，皎漂港的深水港项目就由中国中信集团牵头，未来可能获得90%的股权，并拥有长达50年的特许经营权，这使得缅甸在港口的运营和收益分配上处于被动地位。同样，瓜达尔港的运营权被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COPHC）获得40年，港口腹地也规划为经济特区，巴基斯坦对港口的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被让渡。这种“建设-运营-控制”的模式，使得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 and 战略布局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此外，2015年，中国山东岚桥集团以99年租约的形式获得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的

运营权。然而，达尔文港作为澳大利亚北部重要的战略港口，其附近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驻扎，这一交易引发了澳大利亚国内对国家安全的强烈担忧。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在后期进行了审查，但租约并未被撤销。这个案例表明，即使是在传统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长期租约模式也能穿透其防线，获得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权。

吉布提港的例子也值得一提。吉布提位于红海与亚丁湾的交汇处，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航道之一。中国不仅投资建设了多哈雷多功能港口，还在此建立了中国首个海外军事保障基地。尽管中国官方声称该基地仅用于后勤补给，但它与港口的紧密联系不言而喻。通过对港口的投资和运营控制，中国为自身的军事存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后勤保障。这是一种“以经济筑巢，以军事固巢”的模式，港口作为经济工具，为更深层次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服务。

显然，**这种资本输出并不单纯是经济行为，其也同时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债务依赖和基础设施控制使得目标国家在外交政策上更易与中国保持一致，从而为中国资本在欠发达国家构建势力范围提供了地缘政治支撑。汉班托塔港在国际航道上的战略位置，使中国得以在印度洋的能源运输线上建立长期势力存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公路与能源网络，使巴基斯坦在外交上更倾向于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立场。这种模式与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的“债务外交”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列宁在他的若干著作，尤其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批判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此类“高利贷帝国主义”）：先通过贷款和工程项目绑定目标国，再通过债务和基础设施控制形成政治影响。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一直避免传统的殖民主义手段，即使用直接的殖民占领或军事征服，而是利用全球化的金融与贸易规则，把自己塑造成“发展伙伴”，因此塑造了一个“全体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的形象。**不过显然，这种差异并不能掩盖其帝国主义的实质。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并不打算像旧殖民主义那样全面取代西方资本，更无意主动挤压美国或欧洲资本在全球的核心生存和政治空间。它的目标是最大化自身利润、确保关键资源与市场通道、并借此缓解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矛盾——中国企业需要剥削广大亚洲与非洲国家的资源，也同样有赖与欧洲和美国企业的合作达成广泛的“共赢”。在许多“一带一路”参与国，中国资本与西方资本并非零和竞争，而是长期合作与分工：在巴基斯坦，能源与交通由中方主导，但金融体系、部分制造业依旧由美欧和海湾资本控制；在非洲，矿产开采项目常常是中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与初级加工，而最终的高附加值环节（典型如钻石和黄金产业所催生的奢侈品行业，铝和其他金属开发所产生的末端汽车制造业等等）仍由欧美企业掌握。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体现——一带一路自始至终都无意真正挑战美欧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更遑论取代他们。

正因如此，中国的海外扩张呈现出一种“双重性”——**在国内民族主义宣传中，它被塑造成与西方帝国主义平起平坐、甚至有取而代之潜力的“新型大国”，而在国际**

政治的现实中，它是全球资本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是美国主导秩序下的一个遥远东方国度的稳定承包商。这一双重性既是出于中国统治阶级试图维持国内稳定的需要，也是其在国际体系中生存的现实策略——但这一策略的内在矛盾在于：它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生产力过剩危机，也注定无法真正获得西方核心资本集团的平等接纳——毛泽东曾经说过，“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通过友好竞争自然是无法夺去政治“统战价值”的。就像胎死腹中的亚洲经济联盟和中日韩自贸区一般，一带一路几乎永远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地缘政治摩擦中不断被迫调整姿态。就连自由派所渲染的所谓“中国海外军事基地”代表的帝国主义军事扩张，也仅仅是在吉布提港口，一个几乎所有强大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驻军的地方，修建了一个供海洋巡逻的港口而已。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共的实际“生态位”是世界工厂的牢头，而绝非屠杀“恶龙”的“勇士”。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反噬

在这现实双重性中，“一带一路”以及中国政府所主导的更广泛的海外扩张被国内宣传机器赋予了极高的象征意义。中共深知，单靠海外项目的经济回报不足以在短期内稳固其国内统治，他们必须将这些资本扩张性质的工程包装成民族复兴的标志物，让它们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成为全体国民——尤其是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被动参与的国家集体荣誉工程。这种包装方式并不新鲜，它与美国人的“上帝保佑美国”、一战时期的各类“泛民族主义”乃至二十世纪的军国主义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在对内动员上的做法如出一辙：以虚伪的宏大叙事和民族自豪感掩盖其资本主义扩张的实质，将社会内部的紧张转移到对外的竞争与“赶超”上。在中国的主流媒体和教育体系中，“一带一路”被反复描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重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象征，也是构建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新闻报道和纪录片强调的是“中国速度”“中国智慧”“互利共赢”的故事（张维为、沈逸之流每天高强度念叨的中国自信，我想读者们都不会陌生），而从不提及项目背后的债务结构、目标国本地产业受排挤、工人被剥削压迫等事实。（它们也必然不会提及）

于是，影视作品与文化宣传承担起了为中国资本扩张正名的任务。无论是讲述海外工程建设的电视剧，还是表现中国企业与外国“兄弟国家”合作的纪录片，都强调中方的慷慨、勤劳与技术优势，把资本输出塑造成道义与责任的结合。这类作品中的外国形象往往是友善、感激甚至依赖中国的“伙伴”，以此反衬出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和“复兴”进程——不过中共在这一问题上似乎已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高强度视觉化的民族主义动员不仅强化了公众对外部世界的浪漫想象，更是为中国狂热的小资产阶级和市民集团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似乎明天中国就可以团结起数十个“被西方资本压迫”的“亚非拉兄弟”，对美帝国主义来上“最后的反戈一击”。**对中国光辉外交形象的高强度复读似乎让民众忘记了，中国公民还在家门口的老缅泰被一波又一波的诈骗集团割取器官；他们似乎也忘记了，“黄皮肤小眼睛”的东亚病夫形象至今是从里斯本到大马士革之间每一个国家每一寸土地上的统治阶级对中国人的唯一印象；他们似乎更是忘记了，中国资本的扩张无法带来外国人民对中国人的尊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2025年1月3日的报道中引述多方消息称，莫桑比克在总统选举争议引发的骚乱中出现大规模排华浪潮，不少中国人经营的商店被洗劫，甚至有人驾驶中国援助的装甲车冲撞华人超市。报道还提到，一些当地舆论将中国在莫桑比克的投资和援助视为“与腐败政权结盟”的象征，并在社交媒体上用“新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来形容这种关系。

显然，资本扩张与民族主义宣传并不能掩盖西方霸权与欠发达国家被剥削压迫人民对中国政权的巨大敌意，这对于想要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有自己作为帝国主义力量的一席之地的中共是必然的。显然，这种宣传在国内发挥着巨量的稳定政权功效，通过制造民族共同体的虚幻认同感掩盖国内的阶级分化与利益冲突。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民族主义是一种成本极低、效果显著的政治工具，它能够在短期内缓和社会不满，同时为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提供合法性。然而，这种民族主义与真正的反帝国主义毫无关系，它并不主张工人阶级跨越国界的团结与联合，反而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进行合作与分工，将工人与工人之间可能的联盟扼杀在萌芽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在国内话语体系中的功能，并不仅仅是经济宣传，而是整个所谓“民族复兴意识形态”机器中的关键齿轮。它既向内提供民族团结的幻象，又向外传递中国愿意在既有国际秩序下承担“包工头”角色的信号。在这种双向功能的运作下，中共既能在国内压制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诉求，又能在国际上避免与核心资本集团发生根本冲突。这种姿态，正是它在“强硬”外表之下的真实面貌：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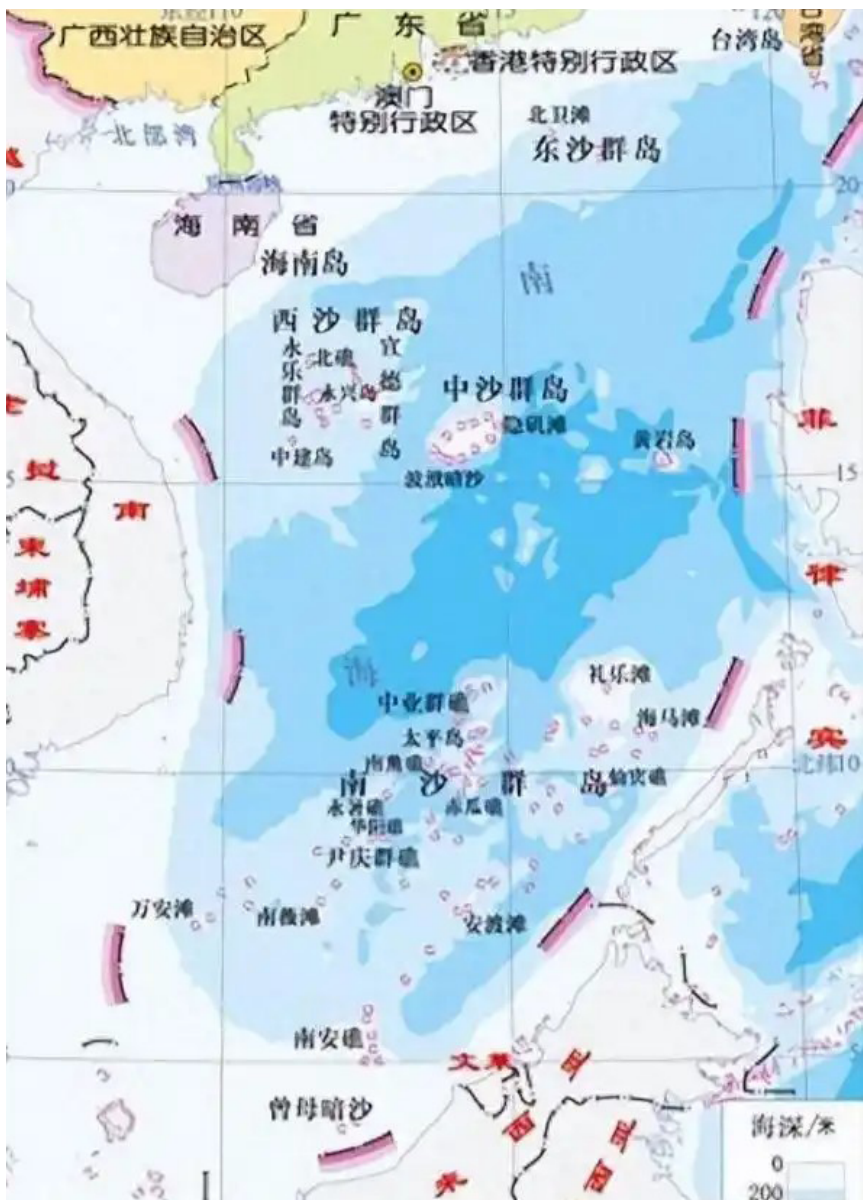
投机、以维持资本主义秩序为最高原则。

这种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民族复兴”宣传工程并不仅限于媒体和影视，它早已渗入到教育、学术、外交话术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小学教材、大学课程以及各类干部培训班上，“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被人为连接成一条“历史长河”，明示这是所谓中华文明“天命”的自然延续——**这种叙事不仅塑造了国民对海外扩张的认同感，更在潜移默化中淡化了阶级矛盾，把国内经济困境的责任转移到所谓“外部挑战”的应对上，让未来的各类专家、社会精英和地方干部习惯性地**把资本输出视为**“无可争辩的国家责任”**。中共在运用民族主义时尽力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它需要民族主义来动员国内情绪，掩盖阶级矛盾，为资本输出与海外工程提供合法性；但它又必须避免民族主义演化为失控的民粹主义或激进的对外冒险主义，尤其是要求“真正对抗日本和欧美”的群众诉求。过度的民族主义会逼迫政府采取高风险的对外政策，而这与它想要在全球资本体系中安稳生存的初衷背道而驰。于是我们看到，中共的对外姿态经常是表面强硬、实则留有巨大的退路：在外交辞令中不乏“坚决反击”的口号，实际操作却常常是谈判、妥协、利益交换。

这种表面强硬与实质妥协的反差、内部宣传和国际事件的反差，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外交中已成为结构化、制度化的操作模式。它不仅是一种策略性的形象管理，更是统治阶级在内外矛盾夹击下的本能反应。对国内而言，“坚决与日本帝国主义、欧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姿态有助于维持民族自信心与政权的威望；对国际而言，背后的妥协与交换则向全球资本和西方列强传递了中国的可预测性与合作意愿。换言之，中共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所谓的双赢体系：**面对国内民众时，它强调“国家尊严”和“绝不退让”；面对国际资本时，它强调“规则遵守”与“互利共赢”**。然而，这种平衡有着脆弱的前提——它假定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是可控的、可被调节的，更假定西方资本愿意让中国人拣去它剩下的残羹剩饭。中共利用民族主义为统治加固基础的同时，也在不断为这种情绪添加燃料。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此种叙事和操作有一个致命问题：它要求国内民众相信两个互相矛盾的神话——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与所有“兄弟国家”平等合作、受到感激和尊重；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时刻警惕西方的遏制与围堵，随时准备“斗争”。在经济增长和就业相对稳定的阶段，这种双重叙事尚能并存，但当经济下行、失业增加、国际摩擦频繁时，民族主义的受众便会开始质疑：既然我们如此慷慨、如此强大，为什么依旧在国际上被轻视、被欺骗、被算计？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投资，那些“阿拉伯人、黑人、东南亚人”，那些“本来应该好好给我们当兄弟当小弟的民族”竟敢“骑到我们的脖子上来”？为什么台湾迟迟不收复？为什么菲律宾都敢在南海耀武扬威？为什么？为什么……这种怀疑一旦积累，就会转化为对政府外交与对外投资政策的不满，而这种情绪往往不受中共的精细引导，最终反而威胁其统治稳定。

一旦外部形势的变化引发公众期待的急剧上升，或者国内经济困境削弱了民族主义叙事的说服力，这种燃料就可能反过来点燃政权不愿承担的政治风险。近几年中美关系的反复波动、中澳、中印等双边摩擦的起伏，都曾在舆论场上制造短暂的民族主义高潮，而每一次高潮之后的政策软化，都让部分公众感到失望甚至愤怒——佩洛西访台是一次高潮，而中共在2024年以来不断只说不做的对台政策更是不断加深这样的情绪。这种情绪积累下来，可能会催生一种与中共意图背道而驰的政治压力——要求它采取更加冒险、更加激烈的对抗姿态。

对于一个在全球资本体系中高度融入、高度服从的政府而言，这种压力是致命的。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虽然具备了与美欧核心资本集团进行全面、长期冲突的物质基础，但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绝不愿意进行这样的最后一步——**中国政府高官子女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欧美国家，他们的私人财产所依赖的国际金融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主导的结算网络，中国资本家的国际市场需求仍是外贸和产业链稳定的生命线。**一旦因国内民族主义推动而采取激进的外交或军事行动导致外贸与投资渠道受阻，中国资本家将彻底被“逼上梁山”，丧失最后闪转腾挪的出路。



同时，深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中国经济必然出现国内就业、财政和社会稳定崩溃，小资产阶级与市民集团也必然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反抗中共的统治——中共统治集团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几乎所有帝国主义扩张之路与其他大国产生矛盾时都选择了妥协与退缩——哪怕在公众视野中这种退路被涂上了“战略克制”的颜料。

这种退路不仅存在于外交谈判桌上，也体现在中国的军事布局与安全战略之中。近年来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南海岛礁的军事化部署、海外保障点的设立，都被国内宣传包装成突破性的战略进展。然而，细看这些军事存在的性质与部署范围，就会发现它们的核心目标完全不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幻想的那样，“南

取百越”的前哨基地。显然，南海的岛礁更多是用来监控与防御能源运输通道，吉布提保障基地主要用于亚丁湾护航和海外工程人员撤离，甚至在中巴经济走廊沿线的安保力量部署也主要围绕着保护中资项目和人员安全，而非扩大区域军事影响力。换句话说，这是一套为中国资本保驾护航的保安策略——显然，一个连在缅甸屠杀自家公民的军阀政权都不敢正面干涉应对的中国政府根本无力进行区域内的军事霸权扩张。

但正如前文所述，双重策略的最大风险在于**民族主义反噬**。一旦公众情绪被长期的高调宣传推到足够高的水平，即便是统治集团自己，也很难在不付出政治代价的情况下让情绪降温。对于一个本就依赖民族主义和对资本扩张的宣传策略来转移阶级矛盾的政权来说，这种局面无异于饮鸩止渴。它需要民族主义来维系统治，但民族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会要求它去承担与自身生存策略冲突的巨大风险——而在历史上，被民族主义情绪绑架的资本主义政权往往会被迫在经济理性与政治生存之间做出痛苦而危险的选择，德意志帝国、沙皇俄国、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等一个个帝国主义先辈正在路上注视着走向深渊的中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死路

如果我们把习近平治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放到上述的全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框架中来看，就会发现它本质上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带有浓厚民族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内部改革**。它的经济基础是国内积累体系陷入瓶颈、资本急需通过对外扩张寻求新的利润空间；它的政治形式是统治集团在维护全球资本秩序的前提下，利用民族主义和宏大叙事巩固内部合法性；它的战略路径是在不与核心资本集团发生根本冲突的条件下，尽可能扩大中国资本的国际份额，并由此换取在国际体系中更稳定的生态位。这一切构成了习近平路线的真实底色——一种以谨慎、退路、风险规避为核心的“强硬”，一种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剥削的“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战略既没有要彻底挑战美欧的决心，也没有要实现真正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能力，它只是在资本主义的笼子里寻找更宽敞的活动空间。**

这种路径的最大局限在于，它**注定无法兑现对国内群众的承诺**。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还是南海、台海、边境的“斗争姿态”，最终都无法转化为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福利的现实成果。相反，工人阶级为这些资本主义扩张项目付出的，是被压低的工资、被剥夺的劳动权利、被削减的公共服务，以及被民族主义狂热所取代的阶级意识。民族主义反噬的风险在中共的统治逻辑中越来越突出。习近平路线依赖民族主义动员来维系统治，却又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展现出不敢越界的保守本质。这种反差让部分民族主义者感到愤怒，并推动他们走向更激进的立场——要求彻底对抗西方、要求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国家统一、要求用“硬实力”证明中国的崛起——本文已经反复证明，这些诉求和资本主义中国的生存逻辑直接冲

突，因为真正的全面对抗将动摇老爷们赖以生存的整个体系。

因此，**习近平治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死路。**它无法通过与全球资本的合作获得真正的平等地位，因为核心资本集团永远不会容许一个潜在竞争者在体系内成长到足以挑战自身的程度，西方政权自己的内部矛盾也不容许出让利益；它也无法通过对外投资的扩张真正解决国内的经济危机，因为这些资本扩张本身就依赖于欧美霸权的市场和国际资本合作；它更无法依靠民族主义长期维持内部稳定，因为这种情绪迟早会要求它付出与资本积累的原始欲望互相冲突的代价。最终，这条道路可能在三种情境下走向终结：一种是国际资本体系的重大危机迫使中国失去赖以生存的外部支撑，在美国与欧洲政权率先崩溃的情况下“幸运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后安全港湾；一种是民族主义反噬推动中国走向高风险的对外冲突乃至全面战争；而最后一种，则是国内阶级矛盾的积累突破民族主义的桎梏，让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诉求重新进入历史舞台。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在于彻底超越现有的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牢笼，打破中共作为全球资本代理人的地位。对于中国工人阶级而言，这意味着必须拒绝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中国共产党所伪造的复兴神话，拒绝为中国资本扩张和海外投资的利润付出代价，拒绝接受与本国统治阶级绑定的虚假民族共同体。**真正的反帝国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同欧美世界争夺份额，而是要彻底打碎这在数百年间压迫中国人民、夺走我们无数条性命与财产的资本主义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互相关联的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8 年至 1990 年代中期的制度转型期，在这一时期，中共放弃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开始主动引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重构国内的生产方式。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积累创造制度条件——土地流转、劳动力市场化、国企改革、私有化和税制改革——而这些改革的代价，是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全面被剥夺，毛时代残存的社会保障体系被拆解，农村集体经济被肢解，城乡分割制度被重新固化。**这一阶段还没实现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工人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但是改革已经为 2001 年的彻底复辟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 1990 年代中期至 2008 年的高速增长期，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工厂”定位逐渐确立。依托廉价劳动力、土地补贴、环境破坏换取的生产成本优势，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迅速占领国际市场，成为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时期的统治逻辑，是用出口创汇推动积累，用投资驱动增长，用压榨劳动力来维持国际竞争力。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外向型经济模式达到巅峰，资本主义也实现了彻底的复辟，但这一模式的内在缺陷也在逐步积累——对外需的高度依赖，对核心技术和市场的严重受制，对资本外流和汇率波动的高度敏感，都为后来危机的爆发埋下

伏笔。

第三阶段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危机应对期，持续至今。2008 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引擎从未完全恢复，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遭遇外需下降的冲击。中共选择通过大规模信贷刺激、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来维持经济增长，结果是债务规模急剧膨胀、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泡沫化和地方财政依赖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这种“内循环”模式的代价，是经济结构更加畸形，社会不平等加剧，工人阶级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到了 2010 年代中后期，这一模式的潜力几乎耗尽，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伟大复兴”和“一带一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危机向外转移的战略尝试。

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种向外转移的逻辑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宿命轨迹。列强的扩张史无不证明，当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海外市场 and 殖民掠夺暂时缓解国内危机时，它同时也在为未来更大规模的危机积累条件——**对外依赖一旦受到冲击，国内危机便会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重蹈历史的覆辙**——只不过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对外扩张必须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体系中进行，必须与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世界核心资本集团形成合作与分工，而这恰恰注定了，资本主义中国绝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霸权挑战者。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中国被动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点则是主动在这一体系中寻找最有利的代理人位置。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与全体中国人民而言，这四十余年的历史是一条不断丧失一切自由的幻梦——从政治权利的丧失，到劳动成果的外流，再到中共的复兴幻想取代阶级意识——一切的一切都将我们带到了这处和 1914 年的欧洲愈发相似的十字路口。而打破这闭环的唯一力量，只能靠我们自己。